

【理论探讨】

# 论档案学的三大研究取向及其当代发展

丁华东 张 燕

**【摘要】**对学科研究取向加以深层次的探察和总结,是对学科发展脉络、演化过程和历史图景的重新阐释和重新描绘。档案学研究中存在着人文、管理和技术三大研究取向,其各自的发展演化过程构成档案学的三条“延传变体链”,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新的发展方向。从互有区别、存在关联的研究取向中,也可看到学科研究传统的存在、绵延和发展,且正在探讨解决越来越复杂的现实难题,也就看到了档案学学科发展的科学进步性、持久生命力和旺盛生机。

**【关键词】**档案学;研究取向;学科发展

**【作者简介】**丁华东,博士,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与社会记忆,E-mail:dinghuadong@shu.edu.cn(上海 200444);张燕,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博士研究生,东华大学档案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与档案开发利用(上海 201620)。

**【原文出处】**《档案学通讯》(京),2019.6.4~10

科学研究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或智力活动,“每一门智力学科都有(是)一部充满研究传统的历史”<sup>[1]</sup>。美国科学哲学家拉瑞·劳丹更是将“研究传统”视为推动学科发展、体现科学进步性的重要力量。学科研究传统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探析,比如学术传统、学人传统、思想传统等,体现学科本体和理论特征的研究取向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档案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历时非久,但悠久的档案实践活动成为理论滋生、发展的丰厚土壤。分析考察档案学研究取向的演化历史及当代变化,对于人们把握档案学术的研究传统、探察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档案学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 1 档案学的三重研究取向

研究取向蕴含着学术研究的目标、价值、路径与方向,对学科发展和研究探讨具有方向性的意义。“一个成功的研究传统是这样的一个传统,它能够通过其组成理论导致越来越多的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获得合适的解答。”<sup>[2]</sup>劳丹关于研究传统的观点为梳理档案学的研究取向提供了思想支撑。研究取向作

为研究传统的重要表征,也成为档案学史分析的关键视角。在不同的研究取向,衍生出研究主旨、内容、方法、结论等各异其趣的诸多档案学理论、观点或见解。从科学研究传统的角度看,它们正体现出研究传统的某些特征,即“每一个研究传统都与一系列的特殊理论联系着,而每一个特殊理论都是为了具体阐明这个研究传统的本体论,说明或满足研究传统的方法论”<sup>[3]</sup>。

吴宝康先生在分析档案学发展时曾提出档案学“一分为三”、各自独立发展的思想,所谓“一分为三”,即从档案管理、档案内容、档案保护三个方向去研究。<sup>[4]</sup>虽然吴老不无遗憾地说档案内容研究未充分发展起来,但笔者认为对档案内容相关联的档案本体及其价值、意义等研究,即对档案的人文研究,一直在档案学中存在;同时,从档案保护研究可以引申出档案技术研究这条主线。循着吴老的思路,笔者从人文、管理、技术三方面来提炼把握档案学的研究取向,这三大研究取向度成为档案学沿革发展的三条历史主线。此外,冯惠玲教授在“2018中国信息资

源管理论坛”的报告中,提出档案学内容呈现“管理、技术、人文三足鼎立”情形,这也对本文三个研究取向的概括提供了有力支持。作为历史的产物,每种研究取向在保持整体向度的同时,又都处于变化之中。某种程度上,这可谓档案学一种理论研究传统的反映,其内在演化形成了档案学术发展的“延传变体链”<sup>[15]</sup>。

人文取向或称人文主义取向,是指档案学中所包含的人文色彩和人文成分,这种成分和色彩既与管理、技术相对应,也与管理、技术中强调的“人文”“人本”理念相区别。档案学研究的人文取向着眼于档案是什么、有何社会功用的问题,既突出表现在人们对档案作为社会历史文化现象的认知和解释上,也突出表现在对档案所具有的政治、历史、文化等价值与意义的认识和探究上。

管理取向或称管理主义取向,是指档案学中以档案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以档案的科学(化)管理为研究内容和价值追求,重点解决档案如何管、怎么用等问题。管理取向与人文取向对档案的性质与价值解说有一定关联性,但更多地是倾向于探讨档案的管理方法和利用方式,寻求发现档案管理和利用的规律,以发挥档案的价值和功用。档案学研究的管理取向既突出表现在人们对档案管理模式、管理环节、管理方法与利用方法、利用方式的探讨、总结和应用上,也突出表现在对国家规模档案事业组织与管理的探讨与实践上,涉及微观管理与宏观管理两个层面。

技术取向或称技术主义取向是指档案学中所包含的技术色彩和技术成分,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采用什么技术手段对档案加以保存和保护,从而有效维护档案载体和信息安全,并有效促进档案信息的利用。在档案管理的历史早期,档案技术研究可以视为管理(方法)研究的一部分,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档案的生成方式、载体形态、保存状态、利用方式和保管要求等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档案管理中的技术成分越来越突出,已成为档案工作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时代

象征。“档案管理应用技术,已经成为当代档案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知识门类。可以说,没有现代的档案管理应用技术,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档案工作现代化。”<sup>[16]</sup>档案技术随社会发展而发展,档案学研究的技术取向突出表现在各历史时期对新技术的运用和研制上。

## 2 档案学研究取向的历史演变

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档案学的不同研究取向既反映出实践的发展,也反映出理论的重要关切,需要从历史实践和档案学史的角度综合加以梳理和概括,从而厘清其发生、发展的渊源和脉络。

### 2.1 档案学人文研究取向的演变

人类对档案这一社会现象或社会存在物的认识自古存在,且随着社会与思维发展不断提升并逐代累积。在我国先秦文献中就有“大道衰,而有书;利害萌,而有契”(《书断》)、“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周易·系辞》)等记载。这反映出人类社会初期较为朴素的档案思想,成为档案学研究人文传统的滥觞。后世文献中类似的记载因革不断,如宋代韩缜的“为治之法,图籍为本”(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明代丘浚的“今世赖以知古,后世赖以知今者”(《明孝宗弘治实录》卷六十三)等。这些关于档案性质、功能的认识思考反映出档案在记录历史和维护统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西方历史发展中对档案存在相同的认知与理解,古罗马人把档案看作“插入鞘中的剑”,欧洲的君主们视之为“国家的胸甲和灵魂”。体现有人文色彩的诸种思想成为档案学思想的发端。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法国大革命爆发及其档案改革,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档案学逐步产生,档案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进入学术视野,两百多年来,人们对档案的定义、本质、属性、范围、种类、作用、价值、生成规律及其相关联的思想意识等问题进行全面探讨,在不断深化档案本质内涵和价值意义认识的同时,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档案学知识体系。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不同观点和见解的提出符合社会研究中人文主义方法论传统,即对社会现象的理解

和解释。从学术史的角度加以宏观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间贯穿着一条人文取向的“延传变体链”,即由政治价值解说,向历史价值,继而向文化价值解说的演变。

德国学者赫尔曼·鲁姆叔特尔指出:16世纪在科学世界观“哥白尼式转变”的影响下,人们开始研究档案的理论与实践,在这一最初的历史阶段,“档案科学的特点来自档案馆赋有的法律性与官方性使命,即保存和整理文献资料的任务。”“在18世纪欧洲各地,在启蒙与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这种原则具体落实在了设立专门的总档案馆的规划或有赖于国家与法律状况的管理模式中。”<sup>[7]</sup>(笔者注:“这种原则”是指方便、务实的管理原则)这一论述反映出18世纪前档案发挥作用的某种社会实际和思维导向,也表达出萌芽时期档案学对档案政治价值的认识与强调。

到18世纪末,档案作用方式的重点由政治价值转向历史价值。1898年法国历史学家朗格鲁在《历史研究导论》上著文指出,由于法国档案改革,已使档案馆从法律上证明封建君主权力的武器库变成了历史的文献库。朗格鲁及其以后学者对档案历史研究价值的强调,深刻地影响到近现代档案学的学科性质,由此,档案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被视为历史学的辅助科目,打上了“历史学”的烙印。如鲁姆叔特尔所言:“档案工作与历史科学工作是互相联系,比肩共存的。”<sup>[8]</sup>

鉴于传统史学的发达和封建政权的强大,近代之前我国对档案政治价值解说与历史价值解说似乎没有像欧洲社会那样体现出强烈的历史阶段性;20世纪初,由于我国档案学是在行政效率运动和“四大(档案)史料新发现”双重力量推动下产生的,档案的政治价值解说和历史价值解说也似乎是并行相当;即使到20世纪50年代,档案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亦同时并重。伴随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 and 史学研究的繁荣,档案学被作为一门历史学辅助科目来建设,档案的历史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档案的文化性质和价值得到新的发现、重视和倡导,从文化视角对档案及其

价值表现加以解说,成为重要学术议题和学术思潮。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A.M.穆鲍在巴黎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由于它们在国家意识和特征的建立中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成为国家文化财产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sup>[9]</sup>今天,这一观点已成公论,但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档案学论著或研究报告中,关于档案文化的论述并不多,以至于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馆长埃思不无感慨地说道,“档案学的问题是阐释自身的文化起源和价值”,但“档案学的文化基础是一个未曾涉及研究的领域”<sup>[10]</sup>,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后,关于档案文化性质和价值的解说才逐步增多,不仅在国际档案理事会、国际档案大会的规划报告和学术报告中可以经常看到相关论述,而且还与国家文化繁荣、文化强国战略、文化强省战略等对接起来,显示出档案文化价值的现实生命力。档案文化价值解说是档案学研究人文取向的集中体现,其典型意义自不待言。

## 2.2 档案学管理研究取向的演变

古今中外都有着丰富的档案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源远流长。我国殷商时代就开始对甲骨档案进行集中窖藏,其制作与保管已有一定的程式和规则。西周时期,王朝档案“登于天府”“藏于金匮”,反映出档案管理的神圣性、神秘性。其中折射出的管理思想只是出于国家管理的需要而自然形成的,西周之后,随着国家管理体系的日趋完备、设官分职的愈益细致,档案管理的机构设置、职官设置和管理措施也日渐体系化、普遍化和制度化,人们对档案管理的实践探索和方法创制越来越由自发走向自觉,体现出档案管理研究取向的深厚历史渊源。其中有三方面的探索具有典型意义:一是宋代江西转运使周湛创制的“千文架阁法”,王金玉先生将其称为“我国古代档案管理中,真正能称得上是一种先进方法”<sup>[11]</sup>;二是自孔子开始历朝历代对档案史料的编纂,或称“比次”“排比故事”,它既涉及编纂行为,也涉及编纂的方法探讨和经验总结;三是各时期对档案工作制度或档案管理制度的创制与承袭,包含着

人们对档案管理的理性认识和思考,也是档案学研究管理取向的思想源泉。

在国外,早在奴隶制时期,古埃及、古两河流域、古希腊、古罗马就建有多种类型的档案库,开始对档案进行有目的的管理活动,并且围绕档案的整理与分类、保管与编目、鉴定和利用等形成了诸多的管理方法。如古亚述国王阿树尔巴尼帕尔档案图书馆、古罗马帝国皇帝档案库均有自己特有的分类体系。这些管理做法都体现出对档案管理实践的探索。进入封建社会后,各国除了继续创新档案管理方法、制度外,欧洲一些国家的档案学者已开始有意识地系统研究档案的整理和分类方法,开启档案管理方法理论探讨的新时代。1571年,德国档案学者冯·拉明根出版《总结报告——怎样才算一个完美的登记室》,提出事由分类法;1632年,意大利档案学者波尼法西奥出版《论档案馆》,提出按地区→事由→时间先后顺序的系统分类法等。<sup>[12]</sup>档案管理方法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不仅为档案学的萌芽产生提供生命的土壤,也充分说明档案学研究的管理取向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

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近现代档案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意味着档案学的管理研究取向的正式确立和巩固。无论是荷兰学者缪勒、斐斯、福罗英的《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1898年)还是英国学者希拉里·詹金逊的《档案管理手册》(1922年)、法国学者弗尔尼埃的《关于档案整理与编目和关于书面历史文献出版的实用建议》(1924年)、意大利学者卡萨诺瓦的《档案学》(1928年),以及当时其他的一些档案论著,探讨的核心主题都是档案的管理和利用问题,围绕档案管理所提出的一些主要理论,如“尊重全宗原则”“登记室原则”“来源原则”“事由原则”等,逐渐成为档案学的核心理论和管理的基本原则,为档案管理提供了理论根基。

18世纪末以来,在档案学研究管理取向的形成、发展与演化中,也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着一条“延传变体链”,即从实体管理理论向信息管理理论的演化。20世纪80年代之前,档案学研究基本上立足于实体

档案管理,探求档案管理的科学化、系统化管理及其提供利用,在关注和解决的重点问题上有以下特征:第一,突出文件与档案管理之间的关联及转化。我国近代在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推动下,公文(文书)管理研究与档案管理研究并行发展。西方档案学著作对文件管理也是所涉甚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件生命周期、文件连续体等相关研究中,更加强调档案与文件的关系,黄霄羽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视为档案学的两大支柱理论之一;胡鸿杰则将文件作为档案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中国档案学正是一门研究管理方式、管理程序和管理资源的学科”<sup>[13]</sup>。这些观点折射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倾向。第二,突出档案管理各环节的具体做法和要求。如《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重点讨论了整理和编目;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着重介绍了档案的鉴定、保管、整理、编目、出版和提供利用;周连宽的《档案管理法》介绍了档案的点收、登记、典藏、销毁和调卷等环节。作为核心环节的整理、分类、编目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第三,突出国家对档案资源不同程度的实际控制。各国档案管理体制虽然不同,但在这一方面的目标是一致的,由此引发对档案收集、档案馆建设、档案组织体系、档案法规制度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即“新三论”)引发档案学研究的深刻变革,推动了实体管理向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转变,所关注和解决的重点问题均发生一些重大变化:第一,重新规划设计档案管理的流程和环节,根据信息管理理论和信息流动规律,将档案管理分为信息收集、信息组织(整序)、信息保管、信息开发和信息反馈等环节;第二,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成为时代主题,相关的著录标引和检索系统等研究得到强化,档案信息开发利用方式方法研究成为长期性学术热点;第三,电子文件管理成为研究新领域,档案界充分认识其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对电子文件管理的原则、模式、流程和要求等进行全面探讨,初步建立起电子文件管理体系;第四,国家层面档案管理标准化、网络化、规

范化问题更加突出,提出并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化。档案学研究信息(资源)管理的转变,或可视为“管理范式的转型”,其主旨仍然是对档案的科学化、系统化管理和有效利用,因此,仍属于档案学管理研究取向的“延传变体链”。

### 2.3 档案学技术研究取向的演变

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采用多种技术方法保护文件,虽然带有利用自然条件的色彩,但反映出人们档案安全保管的意识及其采取的措施,为档案技术研究提供了历史渊源。我国西周时期即“以金为匱,以石为室”来保管王朝档案,反映出一种朴素的档案保护意识,具有“保慎之义”(《史记·高帝纪》)。其后,“石室金匱”作为档案保管的一种原初技术和一项档案保管制度,承袭沿用下来,其典型代表有汉代的石渠阁、兰台、东观、宣明、鸿都,以及明代的皇史宬等。国外早期的档案保管中也存在类似做法。不过,在纸张传入之前,由于制作文件的材料质量耐久性较好,“在中世纪以前,保护并不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sup>[14]</sup>。当时,人们虽然对档案保管采取一些技术措施,但出发点主要是维护政权,还缺少永久性保管的意识和需要。

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近现代档案学产生初期对档案保管保护技术的研究还不多,但已作为研究内容提出来。如意大利卡萨诺瓦在《档案学》(1928年)中提出实用档案学(即档案技术)和本来档案学(档案理论)。二次大战期间及之后,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不仅传统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技术方法广泛应用到档案学中,催生出档案保护技术学,而且照相、摄影、缩微复制、计算机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了档案的载体形态,对档案保护提出新的要求,档案技术特别是“新技术”问题成为推动档案工作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科技发展及档案技术应用进程,档案学技术取向研究可以分为传统档案技术、缩微复制技术、计算机辅助管理技术、数字档案管理技术等四个互有交叉、各有侧重的研究领域,体现出技术取向的“延传变体链”。

在档案技术研发的早期,人们多关注传统载体

档案(主要为纸张)的“预防性”保护,寻求技术上和工艺上的帮助,重点研究解决档案保管、档案的老化蜕变和生物损害问题,通过去酸、修复等延长档案寿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以胶片、磁带、磁盘等为载体的照片、影片、录音(带)、录像(带)档案大量产生,“采用现代科学方法保护档案,是摆在档案保管人员面前的新课题”<sup>[15]</sup>。对新载体档案保护的研究一方面拓展了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其研究内涵。

在档案技术研究中占据重要一席的当属缩微复制技术,这在今天看也属于现代信息处理技术。19世纪30年代发明后主要用于军事情报领域,二战后才逐渐用于图书、报刊、文献资料和档案的保存、传播和使用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缩微复制技术是国际档案界关注的重要课题,自1950年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探讨了“档案与缩微照相”问题,连续共有六届国际档案大会将缩微复制问题列入研讨议题,涵括缩微复制从技术到政策诸多内容。缩微复制技术不单是传统档案的保护保存技术,也是档案信息的传播和利用技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一技术目前正处于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自20世纪60年代起,已有不少国家陆续将计算机用于档案馆的档案管理、编目、检索、库房管理,部分实现档案管理的自动化。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技术)也称“自动化”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新情报”技术等,重点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的快速检索功能,通过建立档案目录数据库,实现对档案的自动查询和统计,提高利用效果和库房管理水平。20世纪60~80年代,计算机辅助管理技术成为国际档案界关注的重点话题,国际档案大会、国际档案圆桌会议就多次探讨过新技术在档案馆中的应用、档案工作的技术进步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适应新技术发展要求的设想和建议。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电子文件的运用与普及极大推进了数字档案管理研究。数字档案管理涉及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多媒体技术、存储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档案领域的全

面、综合运用。与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不同,它不仅涉及传统载体档案的数字化管理,更重要的是各种业务系统和社会活动中直接以数字方式生成的电子文件的管理;不仅涉及传统档案数字化后的编目、存储、检索、利用,更重要的是实现对电子文件、数字化文件的全文管理、全程管理。

数字档案管理技术开始于电子文件管理的研究,后逐步拓展到传统档案数字化领域,两者都是以数字方式存在,因而渐趋统一。在电子文件产生之初,人们就意识到技术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对其管理的意义:“保证电子档案的档案学价值是社会科学的使命,但保证电子档案和电子档案学价值的存在是科学技术的使命。”<sup>[16]</sup>加拿大档案学者M.威斯夫特说:“充分掌握信息形成、贮存、检索和传递方面的技术,对我们专业至关重要。”<sup>[17]</sup>有学者甚至提倡档案人员不应再是档案人员,而应成为计算机专业人员或信息管理人员,以应付新载体文件带来的挑战,显示出某种强烈的“技术主义”取向。经过多年探索,目前已经建立起相对完整的数字档案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如长期存取技术、元数据技术、管理系统设计技术、数据库技术、数字资源库设计技术、网站设计技术、数字档案馆设计技术等),形成对数字档案资源的有效管控。

### 3 档案学研究取向的当代发展

从前述档案学研究取向的历史演化来看,它与社会的发展变迁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面临当代的社会转型和数字转型,档案学研究势必有所呼应,有所应对,并直接反映在研究取向的内容变化上。

#### 3.1 档案学人文研究取向的深化

历史的发展在加速,当我们刚刚意识到并对档案文化价值展开讨论的时候,人们又提出了档案的记忆问题。有学者将档案记忆问题放到档案文化价值中一同解说,但更多的学者则是将档案记忆视为档案学研究的新范式加以讨论。

从认识发生论角度看,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人提及档案的记忆价值,但未能进入学理性层面。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加拿大学者

特里·库克在大会报告中指出“全世界档案人员,仍然在建造记忆宫殿”,但“我们的档案人员在建造记忆宫殿时是如何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的呢?”“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记忆的政治功能以便更好地确定未来方向。”<sup>[18]</sup>这种反身性地提问和思考引领档案学走进“记忆之门”。

不同于档案文化价值解说,档案记忆问题深受社会记忆理论、后现代社会理论、世界记忆工程、电子文件产生等理论与现实的影响,它不仅要思考档案资源、档案管理对社会记忆传承、建构和控制的影响,还需要更深刻思考社会主体(个体或群体)的信仰、兴趣、愿望、知识、能力、利益、情感、社会权力结构、社会情境和现代传媒等对档案记忆形成和档案记忆传承、建构、控制的影响,在为档案学增加更多学术元素的同时,也为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智慧融入档案学打开了一道闸门,其研究成果带有更强的建构性、功能性和解说性。因此,我们称之为档案学的“新人文(主义)传统”,作为当代档案学研究人文取向的新内容。

#### 3.2 档案学管理研究取向的分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档案学研究管理取向正在向以下两个方面转变:

其一是知识管理。档案知识管理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知识经济、知识管理思潮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档案管理理念或档案学研究范式。1996年,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特里·库克提出了著名的“后保管”模式,冯惠玲教授将其解释为“一种以来源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的管理”<sup>[19]</sup>。随后,档案学界展开了对档案知识管理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还通过成立“中国知识管理实验室”、举办“中国知识管理论坛”(年度论坛)等方式推进知识管理研究。档案知识管理研究以知识管理理论为思想引导、以知识挖掘、知识创新和知识服务为理论承诺,探求档案知识价值的实现,是对档案管理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其二是档案治理。“档案治理”是伴随着全球治理、社会治理而出现的档案学新概念,国际档案理事

会2018年会主题即为“档案:治理、记忆与遗产”,其中“治理”涉及“档案(管理)的行政功能,指向综合治理,探讨文件档案与公平正义的关系,档案制度、法律地位和力量,档案的治理和问责作用,数字技术对档案管理和电子政务影响等问题”<sup>[20]</sup>。与实体管理、信息管理关注档案本体不同,档案治理更多关注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透明性、责任性和有效性,具有共建共享共治的特征,“以档案开放和透明度为基础,借助多主体参与方式,实现民主、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发展高远目标。”<sup>[21]</sup>档案知识管理已成为档案管理的“新航标”和“档案专业职能定位的新起点”,而档案治理则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新的全球信息秩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紧密相关,两者学术意义宏阔而深远,因而具有管理取向的新意蕴。

### 3.3 档案学技术研究取向的强化

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人们刚刚开始谈论物联网、云计算时,又出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指出:“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深度学习、区块链、生物基因工程等新技术驱动网络空间从人人互联向万物互联演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将无处不在。”<sup>[22]</sup>面对信息技术多元化、智能化快速发展、融合发展的趋势,我国档案领域已经充分认识到档案领域又(正)“面临一场深刻变革”,这种变革有学者认为是“颠覆性的”。为此,国家档案管理决策层提出“战略转型”的构想,在2017年底的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指出:“要充分了解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特别是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以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发展规划,研究档案工作如何在工作模式、基础设施、法规政策、标准规范等方面与之对接”;同时要求“档案科研要把推动档案工作转型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加强规划,整合资源,集中攻关,形成一批优秀的创新型、实用型科技成果,加速成果转化,创新推广方式,为档案工作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sup>[23]</sup>“新技术”在不断进步,针对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

的深刻变革和运用研究,档案领域已开始起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今天的档案学技术研究已进入了“新技术(主义)时代”。

需要指出的是,档案学的三大研究取向虽然在新的形势下各有变化,甚至形成重大转型,但或许也在产生新的“交织”、新的融合,如“数字人文”的出现等,既可视作档案学研究人文取向的延伸,也可视为管理取向的延续、技术取向的发展。这也符合学科内外交叉、融合的趋势和要求,并有望滋生新的学科增长点。

“不了解一个研究传统的历史,便无法谈论它的进步性。”<sup>[24]</sup>从“研究取向”这一具体“研究传统”的视野出发,对档案学研究的沿革发展史进行梳理和总结,不仅能够勾勒档案学科发展的另一幅“图景”、另一条脉络,也能展现出档案学科发展的历史脚步和科学进步性。从中可以看到学科研究传统的存在、绵延和发展,且正在探讨解决越来越复杂的现实难题,也就看到了档案学学科发展的持久生命力和旺盛生机,进而坚持传承弘扬学科传统,追求理论的创新发展和更大进步。

#### 参考文献:

- [1][3]舒炜光,邱仁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评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59.
- [2]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84.
- [4]参阅:吴宝康.档案学研究中的一些想法[J].档案学通讯,1996(3):12-13.
- [5]“延变体链”是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中阐释传统演化时使用的概念,是“围绕一个或几个被接受和延传的主题而形成的不同变体的一条时间链”(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译序”),反映某传统在其延传过程中呈现出的不断变化状态.
- [6]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80.
- [7][8]赫尔曼·鲁姆叔特尔.档案学作为科学学科的发展[C]//国家档案局.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文集,北京:中国档

案出版社,2002:116,118.

[9]王德俊.档案立法、档案机构和档案基础设施建设的连续性与变化[C]//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96.

[10]U.O.A 埃思.档案学:国家和文化传统,还是一门国际科学? [C]//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212,206-207.

[11]王金玉.王金玉档案学论著[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75.

[12]参阅:黄霄羽.外国档案管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8-38.

[13]胡鸿杰.中国档案学理念与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7-28.

[14][15]凯西帕里亚.档案的保护技术[M]//瓦尔纳.现代档案与文件管理必读,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453,452.

[16]商平安.研究档案学新学科的目的[J].兰台世界,2000(5):7.

[17]M. 斯威夫特.本世纪末的档案工作——回顾与展望

[C]//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41.

[18]特里·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C]//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43-144.

[19]冯惠玲.电子文件时代新思维[J].档案学通讯,1998(6):45-49.

[20][21]黄霄羽,杨青青,黄静,张云.持辩证思维显精神慰藉融社会治理——2018档案年会主题折射国内外档案工作的最新特点和趋势[J].档案学研究,2018(3):133-140.

[22]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73号)[EB/OL].[2018-12-01].[http://www.cac.gov.cn/2016-12/27/c\\_1120198942.htm](http://www.cac.gov.cn/2016-12/27/c_1120198942.htm).

[23]“大数据”时代我国档案工作要加快转型升级[EB/OL].[2018-12-0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2/27/c1122175972.htm>.

[24]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07.

## Three Research Orientations of Archival Science and Their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Ding Huadong Zhang Yan

**Abstract:** A deep exploration and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s of a discipline is to re-interpret and re-describe the development, evolution process and historical prospect of the discipline.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research orientations in archival science: humanistic research,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Thei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process constitute the three "chain of transmitted variants" of archival science, and show a new development direction under the new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From the different and interrelated research orientations, we can also see the existence, continu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tradition, especially the fact that the research tradition is exploring and solving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practical problems, we can see the scientific progress, lasting vitality and vigorous vitality of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in archival science.

**Key words:** Archival science; Research orientation; Discipline development